

创新驱动创业的微观触发机制：基于决断的理论模型^{*}

□ 杨 俊 金 敖 叶文平

摘 要：创新驱动创业是把握并凝练创业时代特征的新兴构念。Zahra (2023) 从创业研究领域发展角度进一步拓展并丰富了创新驱动创业的理论内涵和未来研究方向。本文沿着这一思路，进一步聚焦不确定性这一关键属性，聚焦创新驱动创业的微观触发机制开展延伸理论探讨，并结合中国情境特征提出了研究展望和建议，以期推动和丰富针对这一主题的国内相关研究进展。

关键词：创新驱动创业；不确定性；创业决断

一、引言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关于创业活动异质性的学术判断成为了创业研究领域的基本前提 (Gartner, 1988)，这一异质性不仅表现为情境因素诱发的创业行为和结果差异 (Zahra, 2007)，还体现为创业所蕴含的创新程度不同 (Baumol, 2010; Samuelsson & Davidsson, 2009)。但是，从研究现状来看，无论创业过程学派的“情境—行为—绩效”还是后续深化衍生创业认知研究的“情境—认知—行为”框架都更多强调情境因素对创业的一般性影响 (Baron, 1998; Low & MacMillan, 1988)，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基于创新的创业活动异质性问题 (蔡莉等, 2021)，这是基本事实。

事实上，创业与创新融合的观点脱生于创业研究的经典理论，也是创业研究产生科学价值和实践贡献的思想基础。约瑟夫·熊彼特 (Joseph A. Schumpeter) 认为创业本质上是打破经济系统均衡的新组合或创新，是促进经济内生性增长的“创造性破坏” (Schumpeter, 1934)，这一思想得到彼得·德鲁克 (Peter F. Drucker) 的高度

^{*} 本文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大型企业创新驱动的创业研究” (项目编号: 72091311) 的资助。

认同：“创办夫妻烤肉店并不是创业，只有创办麦当劳才能称得上是创业（Drucker, 1985）。”但是，奥地利经济学派则提出了不同认识，认为经济系统短期内往往处于非均衡状态，创业本质上是填补市场空白的改进型创新甚至是简单模仿，是恢复经济系统均衡的关键力量（Kirzner, 1973）。显而易见，如果将熊彼特思想中的创业称为“熊彼特式”创业、将柯兹纳笔下的创业称为“柯兹纳式”创业，这两类创业活动之间的本质差别在于创新程度以及因此诱发的经济社会影响不同，更为重要的是，经济系统中两类创业活动的配置和比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外部条件，这是熊彼特和柯兹纳的基本共识。“熊彼特式”创业的外部条件来自打破经济系统均衡的发明、技术、社会变革等外生力量（Schumpeter, 1934）；而“柯兹纳式”创业的外部条件则依赖于经济系统因信息和知识不对称诱发的非均衡状态（Kirzner, 1973）。这一共识在近期被学者进一步发展，将诱发不同属性创业活动的外部条件提炼为“外部触发条件”（External Enablers）（Davidsson, 2015；Davidsson & Gruenhagen, 2021）。

既然“外部触发条件”起到基础性甚至是决定性作用，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何创业与创新融合的观点长期存在但已有研究对与创新高度融合的创业活动关注不够。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于1911年首次以德文出版，其理论思想脱生于工业革命和工业社会发端期，随后数十年的工业社会所蕴含的“外部触发条件”与熊彼特的理论构想相去甚远，对经济系统产生重大冲击的创造性变革力量匮乏，因此熊彼特式创业实践极其稀缺，终究沦为大多数人常识

里的极端少数（Schumpeter, 1942）。近年来，信息技术及后续发展数字技术的应用普及，“外部触发条件”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创业与创新之间融合更加紧密，新兴创业实践正在打破甚至摧毁大多数人的常识性判断，这些创业实践不再拘泥于产品或服务创新，更注重基于新技术应用的商业模式创新，更强调新价值创造，具有更加显著而突出的经济社会价值，熊彼特理论中描述的少数偶然已经变得频繁甚至成为主流实践。时势造英雄，基于新技术应用，变革、颠覆和创造性破坏顺势成为近年来学术界和实践界高度关注的热词（Christensen et al., 2018），创新味道浓厚的创业和新创企业已成为打破产业格局和经济秩序的关键主体（Zahra, 2023）。

实践变化显然会带来理论挑战，产生理论回响。近期关注创业的创新属性的研究迅速兴起，大多数研究从宏观角度展开探索，一些研究挖掘宏观因素如何影响经济系统中创新性创业活跃程度（Autio & Rannikko, 2016；Chowdhury et al., 2019；Su, 2021；Tang et al., 2021；Webb et al., 2020；Young et al., 2018），另一些研究甚至直接提出“熊彼特式创业”（Schumpeterian Entrepreneurship）这一学术概念，探索如何测度熊彼特式创业（Henrekson & Sanandaji, 2020），同时提炼熊彼特式创业与经济增长的作用关系（Henrekson et al., 2023）。但是，除了少数例外（Estrin et al., 2022；Hyytinen et al., 2015），微观层次研究仍然非常匮乏，相关研究的数量和深度显然不够（Zahra, 2023）。

创业与创新的融合不仅是历史沉淀的理论判断，当下乃至未来更是时代赋予创业的关键属性，在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商业模式创新

等触发下，创业活动更富有创新味道，不再局限于经典意义上个体主导的机会驱动，而是通过多要素迭代互动、实现多主体共同开发机会来实现价值创造，学术界将其归纳为创新驱动创业（蔡莉等，2021）。创业研究已经提出了不少“主体/情境+创业”的概念或术语，这些概念或术语产生的实践基础是创业异质性，而基本逻辑是从创业主体或创业情境来抽象概括创业实践。但与之不同的是，作为新的学术构念，创新驱动创业并不是从主体或情境角度提炼的特定创业类型，而是强调创新和创业的融合，尤其是强调创业活动的创新属性，这显然与熊彼特的理论思想紧密关联，更重要的是，不拘泥于包容熊彼特式创新，创新驱动创业更深刻的管理内涵是融合信息社会数字经济的时代背景，突出与创新高度融合的创业活动在主体、机会和行为等多方面所表现出的独特属性（蔡莉等，2021），这些属性恰恰是我们在理论层面理解并认识信息社会数字经济时代新兴创业活动规律的关键突破点。从这个意义上说，创新驱动创业是把握并凝练创业时代特征的新兴构念，聚焦这一构念深入研究，不仅在理论上推动并促进创业研究顺应创业实践变化的转型深化，而且有助于在实践层面探索培育并鼓励创新驱动的高质量创业的策略和方法，具有突出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创新驱动创业”这一构念引起了国际学术同行的关注，Zahra（2023）在《管理学季刊》发表《创新驱动创业：新兴经济发展体发展的催化剂》一文，这是一篇理论性文章，不仅是对蔡莉等（2021）所提出“创新驱动创业”构念的积极响应，而且从创业研究领域发展角度

进一步拓展并丰富了创新驱动创业的理论内涵和未来研究方向。这一拓展和丰富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提出并总结了创新驱动创业与普通创业活动之间的差异，进一步丰富了创新驱动创业的学术内涵和关键维度。第二，勾勒出创新驱动创业过程的概念性框架，涉及创新筛选、创新获取、创新转移和转化等关键环节。第三，基于创新驱动创业过程的概念框架，进一步从微观角度（如商业模式创新）讨论了创新驱动创业成功的关键因素，以及从宏观角度（如政府和生态系统）讨论了鼓励并促进创新驱动创业的关键议题。基于上述理论讨论，这篇文章的学术价值一方面体现在从理论和实践层面阐述并丰富了创新驱动创业的过程框架和关键影响因素；另一方面为未来研究探索创新驱动创业如何发生和成长及其经济社会影响等重要问题产生了重要启发。

本文沿着这篇论文的思路，融合创新驱动创业的理论内涵和关键属性，进一步聚焦不确定性这一关键属性，将其与普通创业活动相比较，围绕“为什么有的创业者开展创新驱动创业”这一问题展开延伸理论探讨，并结合中国情境特征提出了研究展望和建议，以期推动和丰富针对这一主题的国内相关研究进展。必须要指出的是，本文的讨论仍然沿袭这篇论文的基本逻辑，注重对可能方向或问题的讨论，并不涉及具体的概念间关系建构。

二、不确定性是创新驱动创业的根本属性

创新驱动创业因富于创新而产生经济社会

影响,这一经济社会影响主要来自“新组合”产生的创造性破坏力量,这是熊彼特理论的重点也是基本逻辑(Schumpeter, 1934)。从微观角度看,创业是创业者与创业机会的结合(Shane & Venkataraman, 2000),而创业机会本质上是能带来新价值创造的“手段-目的”组合关系(Eckhardt & Shane, 2003),创业活动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产生创造性破坏力量的微观基础可能来自创业机会属性,也就是说取决于创业机会所对应“手段-目的”组合关系蕴含的“新组合”的程度和水平。具体而言,具备创造性破坏潜力的机会可能会呈现出如下属性(Schumpeter, 1934):第一,侧重于手段端创新,或者提供新产品或服务(如苹果智能手机)或者引入新的生产方式(如沃尔玛),或者提供一种新的生产要素(如电子商务)。第二,侧重于目的端创新来开拓新的市场。第三,“手段-目的”组合创新,即引入一种新的组织方式(如平台企业)。

换句话说,除了其他特征和属性,创新驱动创业在根本上不同于普通创业活动的特征在于其开发的机会可能具有潜在破坏性,这一破坏性或者在供给端颠覆既有产业的产品或服务、生产方式或生产要素,或者在需求端体现为超越既有产品的功能和属性来创造新的需求和市场,或者采用新的跨边界活动系统来重塑供给和需求的经济联系,例如商业模式创新(Amit & Zott, 2001; Zahra, 2023)。更为重要的是,一旦机会具有潜在破坏性,那么就意味着定义并开发这一机会的创业者要么在供给端进行大胆猜想(如人工智能),要么侧重需求端异想天开(如SpaceX),甚至同时在供给端和需求端创造

“新组合”。与其他创业机会立足于经济系统的局部改进甚至是简单模仿相比较(Kirzner, 1973),不确定性成为具有潜在破坏性的机会与生俱来的根本属性,创业者往往不能在事前知晓创业行动的任何可能结果,但一旦创业成功,创业者可能收获超额的创业租金(Knight, 1921)。

如图1所示,创新驱动创业所投射的创业实践(区间3和区间4)不同于普通创业活动(区间1和区间2),这一不同不仅表现为创新程度差异(例如,相对于区间1和区间2,区间3和区间4所对应的创业活动更富有创新性),更重要的是恰恰因为创新程度不同,创新驱动创业往往基于不确定性情境开展实施,因此很难在事前掌握充分信息来判断行为结果,往往只能在行动过程中不断学习和试错来应对和化解不确定性,进而实现新价值创造(Camuffo et al., 2020; Chen et al., 2022)。更为重要的是,按照经典理论的逻辑,产生重大经济社会影响是创新驱动创业的基本特征,这一影响主要体现为通过创造新业态和新产业等途径来打破行业甚至经济格局(Schumpeter, 1934),但是融合信息社会数字经济的时代背景,一些新兴创业实践(例如,嵌入小米生态系统的新兴企业)仍然可能表现出了浓厚的创新驱动属性(Henrekson & Sanandaji, 2020),这些新兴创业实践借助并与平台企业的数据、信息和市场等资源协同(Adner, 2017),积极开展创新探索,尽管单独创业实践的影响力不大,但這些新兴创业实践汇聚起来产生的整体经济社会影响仍不可小觑。

		经济社会影响力小	经济社会影响力大	
创新程度低	区间1：模仿且影响小的创业 例如：个体户、便利店、自我雇佣、专业服务等	区间2：改进创新为主的创业 例如：通过不断的改进型创新等手段成长为规模化大企业		风险
创新程度高	区间3：创新但影响小的创业 例如：生物医药等传统小行业领域的创业、嵌入平台的新兴创业	区间4：创新且影响大的创业 例如：通过创新来产生颠覆和破坏效应的创新性创业		不确定性

图 1 基于创新属性的创业类型划分

资料来源：Henrekson, M., & Sanandaji, T., Measuring entrepreneurship: Do established metrics capture Schumpeterian Entrepreneurship?,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2020, 44 (4): 733-760.

基于创新驱动创业的高不确定属性，创业者是否开展创新驱动创业的抉择往往具有很突出的主观性，这主要来自不确定性和风险的本质区别及其诱发的决策差异。风险是可度量的不确定性，可以通过信息收集和分析来得知其概率分布；不确定性是不可度量的风险，在当前条件下没有任何信息或方法来知道结果及其可能的概率分布（Knight, 1921）。Knight（1921）进一步指出，基于不确定性，行为结果往往在事前具有不可知性，创业者是否开展创业行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对创业机会可行性的主观评价，基于这种主观评价所产生的创业选择就是创业决断（entrepreneurial judgement）。与之相呼应，不少学者认为在高度不确定情境下，创业意图对诱发创业行动并不起主导作用，决断是创业者选择开展创业行动的关键前因（McKelvie et al., 2011; McMullen & Shepherd, 2006）。

创新驱动创业发生的关键在于创业决断，除了强调创业者在做出创业选择时的主观性（做大多数人认为不可能成功的事情），还隐喻不确定性存在客观事实和主观感知的差异（张

玉利和何良兴，2017）。已有研究表明创业者不仅倾向于规避不确定性（McKelvie et al., 2011），甚至还是风险规避者（Miner & Raju, 2004），基于不确定的客观事实（如技术不确定性），不同个体可能因网络、知识和认知等方面的差异而产生不同的不确定性感知，因个体间感知不同而可能产生不同的行为选择（McMullen & Shepherd, 2006）。换句话说，创业者选择开展创新驱动创业可能是因为感知不确定性不同于其他人，而不是比其他人更加偏好不确定性，那么为什么有的创业者选择开展创新驱动创业而其他人却没有呢？

三、未来研究有必要探索创新驱动创业的微观触发机制

个体为什么选择成为创业者？早期研究强调创业决策是个体在创业与工作之间进行收益-成本比较的结果，如果创业预期收益-成本优于工作，那么个体就会选择开展创业活动（Campbell, 1992），这一逻辑对于生存型等简单

创业活动（见图1中的区间1）可能具有解释力度，但这一逻辑并不适用于大多数难以评估潜在收益的创业活动（见图1中的区间2、区间3和区间4）。

后续研究提出创业意图来解释个体创业决策，这一概念不再拘泥于创业与工作比较，更加聚焦于创业机会价值及其成功可能性的评价判断，认为个体选择创业往往是因为相信自己成功概率很高，这种概率往往高于所感知的行业内其他企业的成功率，也高于行业内历史经验数据所表明的客观成功率（Cooper et al., 1988）。这一观点的价值在于强调在机会价值难以准确估计情境下，诸如成功概率感知、更强的行为控制力，以及直观推断等主观认知偏见对诱发创业意图起到突出作用（Busenitz & Barney, 1997），其局限性在于假设尽管机会价值难以准确估计，但仍可以找到有限客观信息作为决策参考（如行业内其他企业的成功率），这一逻辑后来被概括为创业决策的规则基础观（Wood & Williams, 2014），但这种逻辑显然难以充分解释在事前无法获取任何信息来估计结果的创业决策（见图1中的区间3和区间4）。

正因如此，过去十余年里，不确定性开始真正被纳入到创业行为和决策研究框架中，涌现出了一些很具有启发性的研究成果（Alvarez & Barney, 2005; McMullen & Shepherd, 2006; Sarasvathy, 2001），这些研究成果为我们理解创业者在不确定性情境下的创业决策提供了重要基础（见图1中的区间3和区间4）。在其中，McMullen和Shepherd（2006）的研究最具有代表性，在他们看来，在不确定性情境下，个体创业决策不是在某一时点的决策，更不是盲目

的试错或赌博，而是看似非理性但极具理性成分的系列决断过程，同时这一过程具有双重属性。一方面是机会信念形成过程，即个体往往起步于洞见“外部触发条件”背后蕴含的可能机会领域（第三人称机会），通过信息收集、信息解读、试错学习、实验等行动来不断形成新认识和新判断，并在此基础上不断加工和打磨之前的创意或想法，最终形成了尽管他人否定但自己相信可行的机会（第一人称机会）。另一方面是不确定性感知的转化过程，这一过程意味着新的信息收集以及基于信息分析和解读的判断，尽管在机会没有付诸实践之前，没有人能预测可能产生的结果（Knight, 1921），客观不确定性仍然存在，但与机会信念产生相伴随的是，基于系列决断（尽管尚未实践充分验证），个体的不确定性感知在这些决断前提下可能就转变为了风险情境，个体可以基于在行动中获取的有限客观信息做出创业决策（McKelvie et al., 2011）。

如前所述，基于具有潜在破坏性创业机会的高不确定性是创新驱动创业的本质属性，那么个体选择开展创新驱动创业可能取决于两个基本条件：一是个体能发现具有破坏性潜力的创业机会（Shane & Venkataraman, 2000）；二是相对于其他人，在这一机会情境下，个体因感知的不确定性水平更低而选择创业而不是放弃（McMullen & Shepherd, 2006）。基于此，本文提出了创新驱动创业的微观触发机制模型，目的是启发未来研究进一步探索并解释为什么有的创业者选择开展创新驱动创业而另一些不能等基础性问题。必须要指出的是，尽管宏观因素或者说“外部触发条件”可能是驱动创新

驱动创业的关键因素（Kirzner, 1973; Schumpeter, 1934; Zahra, 2023），为了简化理论讨论，本文的理论模型重点在于创新驱动创业的微观机制，并没有将宏观因素纳入机制讨论。

具体而言，创业研究基本认同创业者网络、经验和认知是解释创业行为发生、过程及其结果的关键因素（Birley, 1985; Shaver & Scott, 1991; Sexton & Upton, 1985）。具体而言，基于网络视角的研究聚焦于探索创业者网络特征如何影响创业活动的信息和资源机制（Hoang & Antoncic, 2003; Witt, 2004）；基于经验视角的研究主要探索创业者经验特征如何影响创业活动的知识机制（Shane & Venkataraman, 2000）；基于认知视角的研究主要探索创业者如何基于

所掌握信息来调动知识存量来进行决策的认知机制（Baron, 1998）。如图2所示，本文认为创业者网络、经验和认知仍然是影响其是否选择开展创新驱动创业的关键因素，但是基于创新驱动创业的高不确定性，诱发创新驱动创业的网络和经验等要素属性可能不同于普通创业活动，非常值得进一步研究。概括起来，本文认为创业者所嵌入的网络位置属性可能通过信息机制来影响其发现具有破坏性潜力的创业机会可能性，创业者的以专长为关键属性的深度经验可能通过知识机制来影响其基于创业机会的感知不确定性水平，而认知机制可能会对信息机制和知识机制起到约束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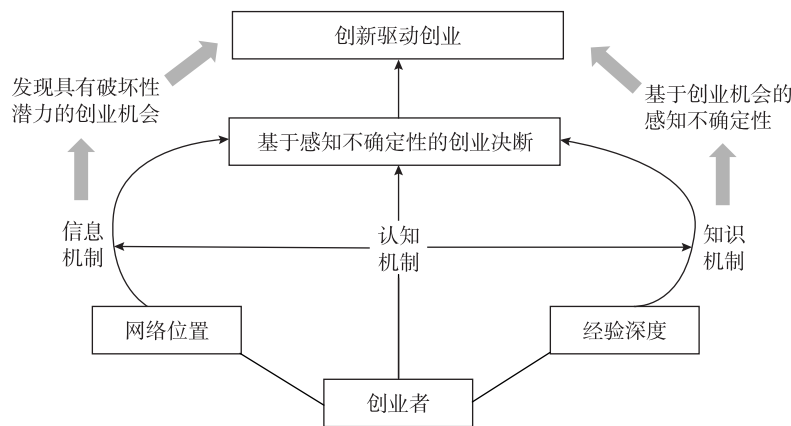


图2 创新驱动创业的微观触发机制

首先，信息机制可能影响着什么样的个体更容易发现具有破坏性潜力的创业机会。创业机会是“手段-目的”组合关系，而承载这一组合关系的关键因素是个体是否能获得相关信息以及如何是否能解读出信息背后蕴含的机会（Eckhardt & Shane, 2003; Shane & Venkatara-

man, 2000; 张玉利等, 2008）。创新驱动创业注重挖掘具有破坏性潜力的机会，承载这样机会的信息属性就可能不同于承载普通创业机会，换句话说，这些信息可能并非是有资源配置不充分、市场效率低下等关乎经济系统非均衡状态的信息（Kirzner, 1973）。承载具备破坏性

潜力的创业机会信息可能具有较高的新奇性 (Novelty), 这一新奇性并非是绝对意义上的标新立异, 而是相对于所涉及创业领域的新奇性, 信息新奇性越高, 所诱发创业机会的潜在破坏性可能就越强 (Schumpeter, 1934)。这些信息可能包括最新的技术发明、技术发明的新场景、市场中长期存在但尚未得到有效解决的问题等 (Shane & Venkataraman, 2000)。基于信息新奇性, 创业者在所嵌入网络中所处的位置而非网络本身特征就可能起到重要而关键的基础作用。具体而言, 如果个体处于两个不相关领域内网络的结构桥位置 (Burt, 1992), 那么个体就具有很强的信息优势, 就更容易获取新奇性更高的信息, 进而看到潜在的新组合机会 (Low & Abrahamson, 1997)。例如, 在创办阿里巴巴之前, 马云先生在北京的创业经历赋予了其嵌入互联网技术网络的机遇, 有助于深化理解和认识互联网这一技术可能的商业价值领域, 同时他也嵌入到了浙江本地企业家网络, 熟悉了解他们面临的问题, 在回到杭州后, 将这两个网络中的异质性知识组合起来就产生了创造新组合的创意和想法 (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充分利用互联网的连接红利)。与已有创业研究更多关注关系强度、职业网络等对机会发现可能性不同, 未来研究可能有必要探索网络规模、网络中心度、结构洞, 以及所连接网络群组多样性等因素对于其发现具有潜在破坏性机会的影响机制。

其次, 知识机制可能影响着什么样的个体更容易产生低水平的不确定性感知, 这里的知识机制并不是指一般意义上的行业知识或企业层面的职能管理知识, 而是侧重于技术端或市

场端的深度知识, 这一深度知识往往是有助于产生洞见的专长 (Knight, 1921; McKelvie et al., 2011)。如果个体在既定领域内具有较长时间工作经历, 同时这些经历塑造了其在这一领域内的核心能力, 那么个体就成为了专家 (Foley & Hart, 1992)。一旦具备特定领域内的深度知识, 在不确定情境下, 个体不仅可能知道得更多, 而且还更善于灵活采用不同的途径和方法来了解未知不确定性, 也就是具有更好的学习能力 (Adelson, 1981; Gustafsson, 2006)。基于这些优势, 尽管专长并不能消除不确定性, 但基于专长的深度知识有助于提升个体吸收和学习能力 (Cohen & Levinthal, 1990), 进而形成更好的新信息解读和新知识获取能力, 因此可能有助于个体产生更低的不确定性感知, 这一低水平感知主要来自专家可能比大多数人更不容易觉察到不确定性的影响 (Kaustia et al., 2008)。事实上, McKelvie et al. (2011) 利用联合分析的研究设计, 发现专长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到个体对不确定性的感知, 具备专长的个体可能会认为市场变化和技术变化的可预测性更强。但令人遗憾的是, 尽管学者们很早就注意到这方面研究的价值 (Read & Sarasvathy, 2005), 但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还不多。未来研究可能有必要通过实验研究甚至是自然实验等研究设计, 考察创业者聚焦技术端或市场端的知识结构特征及其与机会的匹配水平是否以及如何影响其感知不确定性的程度和属性差异。

最后, 未来研究还有必要进一步探索认知机制对信息机制和知识机制的作用力度和大小可能约束作用, 这些认知机制往往是过度自信、控

制幻想等可能诱发偏见和偏差的独特认知机制 (Baron, 1998; Busenitz & Barney, 1997)。例如, 过度自信往往是创业者面临的重要认知偏差, 这一偏差可能会在具备网络优势和知识优势的个体身上表现得更加突出。基于过度自信, 创业者可能会高估自己预测并判断未来的认知能力, 特别是在自己熟悉的领域内更是如此 (Arkes et al., 1986; Fischhoff, 1982; Gustafsson, 2006)。

综上所述, 与普通创业活动不同, 创新驱动创业强调创业的创新属性, 这一属性主要表现为机会的潜在破坏性。为此, 本文进一步延伸讨论了创新驱动创业的不确定性问题, 并基于此进一步在微观层次诱发创新驱动创业的信息机制、知识机制和认知机制, 期待未来研究在理论和实证层面进一步凝练并探索为什么有的创业者选择开展创新驱动创业而另一些却不能, 以期进一步丰富我们有关信息社会数字经济时代创新驱动创业从何而来的理论认识。

四、中国情境下开展创新驱动创业研究的启示

近年来, 基于互联网、信息技术和数字技术等新兴技术的应用普及, 我国创业实践在创业活跃度方面甚至已经超越了美国、英国和德国等发达国家, 但我国创业活动以模仿性创业为主、创新性创业比例不高仍然是当前面临的基本态势 (高建等, 2020)。在当下乃至未来, 如何有效促进创新驱动创业活动不仅是理论研究的前沿问题, 而且是关乎国计民生的重大战略问题。为此, 本文进一步归纳了 Zahra (2023) 给国内学者开展相关研究带来的几点重

要启示。

第一, 在理论和实证层面积极探索如何解构并观测创新驱动创业这一构念, 这是我们进一步认识创新驱动创业的行为过程及其影响因素的关键而基础性的问题。事实上, 已有有关创新性创业的研究从如何观测并测量创新性机会可能为进一步解构并观测创新驱动创业提供了重要参考 (Cliff et al., 2006; Samuelsson & Davidsson, 2009; Tang et al., 2021); 近期有关“熊彼特式”创业的理论解构和实证观测的研究努力也从创业结果角度提供了新的理论参考 (Henrekson & Sanandaji, 2020)。更为重要的是, 基于创新驱动创业的不确定性属性, 不同于宏观层次的观测指标, 微观层次的观测指标可能有必要以创新驱动创业的创新属性为重点, 以其机会属性 (潜在破坏性) 为基础同时兼顾其行为特征展开, 而宏观层次的指标可能侧重于从创业结果角度展开, 重点是识别其因创新所产生的多层次结果和影响力大小 (Henrekson & Sanandaji, 2020)。

第二, 注重融合“微观-宏观”视角展开跨层次分析。与普通创业活动相比较, 创新驱动创业尽管相对于以往变得更加普遍, 但仍旧是创业群体中的关键少数, 代表着以不确定性为核心的极端创业情境, 由于不确定性的外生和客观属性, 微观机制可能起作用但并不充分, 微观因素与“外部触发条件”的交互作用就成为剖析和理解创新驱动创业的关键所在 (Davidsson & Gruenhagen, 2021; Zahra, 2023), 同时也可能会产生更加重要而深远的政策和应用影响, 例如近期研究提出并检验了破产法的债务设计如何诱发潜在创业者不确定性规避效应,

进而阻碍个体开展高成长创业的内在机理 (Estrin et al., 2017; Schulz et al., 2021)。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探索并检验其他与创新驱动创业高度相关同时又可能诱发不确定性感知的制度因素(如产权制度、专利和知识产权保护、税率制度)是否以及如何影响个体在识别到高潜质机会后开展创新驱动创业的内在机理。以往研究强调了创业友好的营商环境的作用(杜运周等, 2020), 站在创业异质性角度来看, 未来开展这方面研究的重要价值在于为营造并优化有利于创新驱动创业的营商环境提供科学参考和依据, 显然有助于提高相关政策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第三, 除了宏观环境, 更有必要深刻揭示我国创新驱动创业活动动态变化的微观机制。近十年来, 随着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不断深化实施, 我国不断加大创新投入并取得了显著成效, 《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 2022年我国排名第11位, 连续十年稳步提升, 位居36个中高收入经济体之首。基于创新成效, 我国近年来创新驱动创业开始涌现, 但整体比例相对于创新成效而言显然偏低, 创新驱动创业是将技术等要素创新成果转化为经济社会价值的重要抓手(蔡莉等, 2021; Zahra, 2023), 未来研究更有必要深入探究我国创新驱动创业活动动态变化背后的微观机制。直观判断, 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化, 关键信息和资源获取的体制障碍在长期内不断下降(张玉利等, 2008), 相比于信息机制, 尽管创业者群体的平均学历层次不断提高, 但其知识结构的改善速度可能远远落后于信息机制, 这可能成为制约我国创新驱动创业的涌现的关键因素。未来研究可以采用跨地区比较的纵向研究设计, 深入探究信息机制和

知识机制分别在触发创新驱动创业方面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两者又如何交互、替代或互补?

第四, 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是触发创新驱动创业的关键外部因素(蔡莉等, 2021)。从时间角度来看, 改革开放以来的创业热潮首先得益于制度创新解放的民间创造力和活力, 随着而来的是20世纪90年代的互联网等信息技术创新, 在过去20余年里, 基于新兴技术应用的商业模式创新又成为更加关键的驱动力量。大胆判断,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改革开放深化实施、数智技术等新兴技术平行涌现趋势的不断强化、企业价值创造逻辑的持续创新等现实很可能会诱发“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商业模式创新”多要素共演的有利条件, 同时也在塑造更加复杂系统的创业环境。更为重要的是, 创新差异意味着不确定性属性和特征差异(例如, 技术创新更多地强调市场端的不确定性, 制度创新意味着运营端的不确定性, 而商业模式创新可能意味着市场端与供给端的双重不确定性), 不确定属性和特征差异则意味着信息机制和知识机制的作用力度和方式不同(McKelvie et al., 2011)。基于这一判断, 未来研究很有必要进一步探究创新驱动创业的外部触发因素对微观触发机制的约束作用, 例如, 什么样知识结构的创业者更可能抓住技术创新(或制度创新或商业模式创新)诱发的创新驱动创业机会? 嵌入什么样网络结构的创业者更善于把握基于技术创新(或制度创新或商业模式创新)诱发的创新驱动创业机会? 还可以聚焦某些特定创业主体(如学术创业或科学家创业)展开纵向案例研究, 不局限于描述科学家如何将科学或技术知识转化为商业化应

用，更重要的是探索科学家如何基于特定知识结构和网络结构来产生复杂的不确定性感知（如侧重于技术端和市场端的不确定性）进而诱发创新驱动创业的深层次机理。

五、结语

当下乃至未来，创新驱动创业对于促进国家经济长期增长和提升国家竞争优势具有战略性意义，这一意义不仅来自创新与创业的高度融合带来的价值创造和超额利润，而且来自借由创新驱动来创造并贡献的新商业知识和智慧，前者关乎国家商业系统的价值竞争力，而后者关乎国家商业系统的文明竞争力。从这一点意义上看，Zahra（2023）的研究不仅是强调创新驱动创业对于新兴经济体的重要价值，而是在倡导并呼应如何通过科学严谨的研究来揭示创新驱动创业如何发生和成长的跨层次机制，必然会对提升创新驱动创业研究成果的理论重要性方面起到突出推动作用，也必然会对国内相关研究工作起到重要的启发作用。

作者简介

杨俊，管理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职于浙江大学管理学院、南开大学创业研究中心。

金敖，浙江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叶文平，管理学博士，副教授，现任职于暨南大学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1] Zahra, S. A. : 《创新驱动创业：新兴经济体—80—

发展的催化剂》，《管理学季刊》，2023年第4期。

[2] 蔡莉、张玉利、蔡义茹、杨亚倩：《创新驱动创业：新时期创新创业研究的核心学术构念》，《南开管理评论》，2021年第4期。

[3] 杜运周、刘秋辰、程建青：《什么样的营商环境生态产生城市高创业活跃度？——基于制度组态的分析》，《管理世界》，2020年第9期。

[4] 高建、牟睿、董雅莉、付鹏：《全球创业观察（GEM）中国报告 2019/2020》，<https://www2.gem-consortium.org/report>，2020年。

[5] 张玉利、何良兴：《网络情境下的不确定性问题研究：客观和主观融合的视角》，《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7年第6期。

[6] 张玉利、杨俊、任兵：《社会资本、先前经验与创业机会——一个交互效应模型及其启示》，《管理世界》，2008年第7期。

[7] Adelson, B. 1981. Problem solving and the development of abstract categories in programming languages. *Memory & Cognition*, 9 (4): 422-433.

[8] Adner, R. 2017. Ecosystem as structure: An actionable construct for strategy. *Journal of Management*, 43 (1): 39-58.

[9] Alvarez, S. A. , & Barney, J. B. 2004. Organizing Rent Generation and Appropriation: Toward a Theory of the entrepreneurial theory firm.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19 (5) 621-635.

[10] Alvarez, S. A. , & Barney, J. B. 2005. How do entrepreneurs organize firms under conditions of uncertainty? *Journal of Management*, 31 (5): 776-793.

[11] Amit, R. , & Zott, C. 2001. Value creation in e-business.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2 (6-7): 493-520.

[12] Arkes, H. R. , Dawes, R. M. , & Christensen, C. 1986.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use of a decision rule in a

probabilistic task.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37 (1): 93–110.

[13] Autio, E., & Rannikko, H. 2016. Retaining winners: Can policy boost high-growth entrepreneurship? *Research Policy*, 45 (1): 42–55.

[14] Baron, R. A. 1998. Cognitive mechanisms in entrepreneurship: Why and when entrepreneurs think differently than other people.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13 (4): 275–294.

[15] Baumol, W. J. 2010. *The Microtheory of Innovative Entrepreneurship*.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6] Birley, S. 1985 The role of network in the entrepreneurial process.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1: 107–117.

[17] Burt, R. S. 1992. *Structural Holes: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Competit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8] Busenitz, L. W., & Barney, J. B. 1997. Differences between entrepreneurs and managers in large organizations: Biases and heuristics in strategic decision-making.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12 (1): 9–30.

[19] Campbell, C. A. 1992. A decision theory model for entrepreneurial acts.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17 (1): 21–27.

[20] Camuffo, A., Cordova, A., Gambardella, A., & Spina, C. 2020. A scientific approach to entrepreneurial decision making: Evidence from a randomized control trial. *Management Science*, 66 (2): 564–586.

[21] Chen, J. S., Elfenbein, D. W., Posen, H. E., & Wang, M. Z. 2022. The problems and promise of entrepreneurial partnerships: Decision-making, overconfidence, and learning in founding teams.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47 (3): 489–520.

[22] Chowdhury, F., Audretsch, D. B., & Belits-

ki, M. 2019. Institutions and entrepreneurship quality.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43 (1): 51–81.

[23] Christensen, C. M., McDonald, R., Altman, E. J., & Palmer, J. E. 2018. Disruptive innovation: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and direc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 55 (7): 1043–1078.

[24] Cliff, J. E., Jennings, P. D., & Greenwood, R. 2006. New to the game and questioning the rules: The experiences and beliefs of founders who start imitative versus innovative firms.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21 (5): 633–663.

[25] Cooper, A. C., Woo, C. Y., & Dunkelberg, W. C. 1988. Entrepreneurs' perceived chances for success.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3 (2): 97–108.

[26] Davidsson, P. 2015. Entrepreneurial opportunities and the entrepreneurship nexus: A re-conceptualization.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30 (5): 674–695.

[27] Davidsson, P., & Gruenhagen, J. H. 2021. Fulfilling the process promise: A review and agenda for new venture creation process research.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45 (5): 1083–1118.

[28] Drucker, P. F. 1985. Entrepreneurial strategies. *California Management Review*, 27 (2): 9–25.

[29] Eckhardt, J. T., & Shane, S. A. 2003. Opportunities and entrepreneurship. *Journal of Management*, 29 (3): 333–349.

[30] Estrin, S., Korosteleva, J., & Mickiewicz, T. 2022. Schumpeterian entry: Innovation, exporting, and growth aspirations of entrepreneurs.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46 (2): 269–296.

[31] Estrin, S., Mickiewicz, T., & Rebmann, A. 2017. Prospect theory and the effects of bankruptcy laws on entrepreneurial aspirations.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48 (4): 977–997.

- [32] Fischhoff, B. 1982. *Debiasing in Judgment under Uncertainty: Heuristics and Bias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33] Foley, M. , & Hart, A. 1992. Expert–novice differences and knowledge elicitation. In *The Psychology of Expertise: Cognitive Research and Empirical AI*. Mahwah NJ: Springer–Verlag.
- [34] Gartner, W. B. 1988. “Who is an entrepreneur?” is the wrong ques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Small Business*, 12 (4) : 11–32.
- [35] Gustafsson, V. 2006. *Entrepreneurial Decision-making: Individuals, Tasks and Cognitions*.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 [36] Henrekson, M. , Johansson, D. , & Karlsson, J. 2023. To be or not to be: The entrepreneur in neo–schumpeterian growth theory.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doi. org/10. 1177/1042258722114167.
- [37] Henrekson, M. , & Sanandaji, T. 2020. Measuring entrepreneurship: Do established metrics capture schumpeterian entrepreneurship? .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44 (4) : 733–760.
- [38] Hoang, H. , & Antoncic, B. 2003 Network–based research in entrepreneurship: A critical review.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18 (2) : 165–187.
- [39] Hyttinen, A. , Pajarinen, M. , & Rouvinen, P. 2015. Does innovativeness reduce startup survival rates?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30 (4) : 564–581.
- [40] Kaustia, M. , Alho, E. , & Puttonen, V. 2008. How much does expertise reduce behavioral biases? The case of anchoring effects in stock return estimates. *Financial Management*, 37 (3) : 391–412.
- [41] Kirzner, I. M. 1973. *Competi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42] Knight, F. H. 1921. *Risk, Uncertainty and Profit*. New York : Augustus Kelley.
- [43] Low, M. B. , & Abrahamson, E. 1997. Movements, bandwagons, and clones: Industry evolution and the entrepreneurial process.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12 (6) : 435–457.
- [44] Low, M. B. , & Macmillan, I. C. 1988. Entrepreneurship: Past research and future challenges. *Journal of Management*, 14 (2) : 139–161.
- [45] McKelvie, A. , Haynie, J. M. , & Gustavsson, V. 2011. Unpacking the uncertainty construct: Implications for entrepreneurial action.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26 (3) : 273–292.
- [46] McMullen, J. S. , & Shepherd, D. A. 2006. Entrepreneurial action and the role of uncertainty in the theory of the entrepreneur.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31 (1) : 132–152.
- [47] Miner, J. B. , & Raju, N. S. 2004. Risk propensity differences between managers and entrepreneurs and between low–and high–growth entrepreneurs: A reply in a more conservative vein.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89 (1) : 3–13.
- [48] Read, S. , & Sarasvathy, S. D. 2005. Knowing what to do and doing what you know: Effectuation as a form of entrepreneurial expertise. *The Journal of Private Equity*, 9 (1) : 45–62.
- [49] Samuelsson, M. , & Davidsson, P. 2009. Does venture opportunity variation matter? Investigating systematic process differences between innovative and imitative new ventures.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33 (2) : 229–255.
- [50] Sarasvathy, S. D. 2001. Causation and effectuation: Toward a theoretical shift from economic inevitability to entrepreneurial contingency.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6 (2) : 243–263.
- [51] Schulz, M. , Schwens, C. , & Fisch, C. 2021.

Bankruptcy regulation and self-employment entry: The moderating roles of income share, parenthood, and hybrid entrepreneurship.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45 (6): 1522-1549.

[52] Schumpeter, J. 1934. *The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53] Schumpeter, J. 1942.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54] Shane, S., & Venkataraman, S. 2000. The promise of entrepreneurship as a field of research.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5 (1): 217-226.

[55] Shaver, K. G., & Scott, L. R. 1991. Person, Process, (choice): The Psychology of new venture creation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16 (2): 23-45

[56] Stuart, R. W., & Abetti, P. A. 1987. Start-up ventures: Towards the Prediction of early success.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2 (3): 215-230

[57] Su, Z. 2021. The co-evolution of institutions and entrepreneurship.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 38 (4): 1327-1350.

[58] Tang, J., Yang, J., Ye, W., & Khan, S. A.

2021. Now is the time: The effects of linguistic time reference and national time orientation on innovative new ventures.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36 (5): 106142.

[59] Webb, J. W., Khoury, T. A., & Hitt, M. A. 2020. The influence of formal and informal institutional voids on entrepreneurship.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44 (3): 504-526.

[60] Witt, P. 2004. Entrepreneurs' networks and the success of start-ups. *Entrepreneurship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16 (5): 391-412

[61] Wood, M. S., & Williams, D. W. 2014. Opportunity evaluation as rule-based decision making.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 51 (4): 573-602.

[62] Young, S. L., Welter, C., & Conger, M. 2018. Stability vs. Flexibility: The effect of regulatory institutions on opportunity typ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49 (4): 407-441.

[63] Zahra, S. A. 2007. Contextualizing theory building in entrepreneurship research.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22 (3): 443-452.

The Micro-foundations of Innovation-driven Entrepreneurship: A Judgement-based Model

Jun Yang¹ Ao Jin¹ Wenping Ye²

(1. School of management, Zhejiang university; 2. School of management, Jinan university)

Abstract: Innovation-driven entrepreneurship is an emerging construct that captur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ntrepreneurial era. Future research focusing on this construct not only promotes the transformation of entrepreneurial research in line with the changes of entrepreneurial practice, but also helps to explore strategies and methods to cultivate and encourage innovation-driven high quality entrepreneurship, which has grea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value.

Zahra (2023) enriched the theory of innovation-driven entrepreneurship and provided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development of entrepreneurship research. Following his theoretical discussion, this paper bases on the theory and key attributes of innovation-driven entrepreneurship, compares innovation-driven entrepreneurship with ordinary entrepreneurship, and proposes that uncertainty is the essential attribute of innovation-driven entrepreneurship. According to this theoretical judgment, this paper proposes a micro-foundations model of innovation-driven entrepreneurship, including information mechanism, knowledge mechanism and cognitive mechanism of innovation-driven entrepreneurship. Specifically, this paper believes that the attributes of network location embedded by entrepreneurs may affect the possibilities of discovering disruptive entrepreneurial opportunities through the information mechanism, and the deep experience of entrepreneurs with expertise may affect their perceived uncertainty level of entrepreneurial opportunities through the knowledge mechanism. However, the cognitive mechanism may constrain the information mechanism and the knowledge mechanism.

In the end,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research prospects and suggestions based on the Chinese context,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domestic research progress on innovation-driven entrepreneurship.

Key Words: innovation-driven entrepreneurship; uncertainty; entrepreneurial judgement